

# 新民主主義中的 領導權問題

●魯亦冬

## 一 引言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毛澤東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闡述這一問題時，在堅持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的同時，也須承認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與此相適應，他還曾主張成立包括國共兩黨，甚至以國民黨為主的聯合政府，反對任何一種形式的「一黨專政」，他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實際上是一種多黨民主制度。40年代後期，隨着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的演變和中國共產黨政治地位的改變，毛澤東修改了原來的理論。1949年以後，他又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作了大量的增、刪、改，掩飾了他原來的觀點。本文擬通過上述三篇文章的不同版本的比較，說明毛澤東原來關於領導權問題的觀點以及後來發生的變化。

毛澤東的這三篇文章在1949年以前有過多種版本。本文所依據的是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作為幹部必讀的黨內文件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上述三篇文章均在這部選集的下冊。新華書店1949年5月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和同年6月出版的《論聯合政府》單行本，同晉冀魯豫版《毛澤東選集》中的這兩篇文章，只是在個別文字上有所不同。還應指出，這些都不是這三篇文章的最早版本，其中有的文章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曾修改過，但仍能較充分地反映毛澤東的原來觀點。以下將晉冀魯豫版《毛澤東選集》稱為原版，將1949年後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稱為新版。所註頁碼都是據新版《毛澤東選集》。

## 二 歷史的回顧

在介紹毛澤東三篇文章的修改情況以前，先簡要地回顧一下有關歷史。

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是在1925年初召開的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四大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案》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得到勝利。」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初期，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意味着共產黨要爭取使自己的黨員在國民黨內取得領導的地位。這實際上是對原來一直處於革命領導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挑戰，表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領導權問題上將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而且可能出現雙方同時處於領導地位的局面。

1927年，國共統一戰線破裂。第二年中共召開的第六次代表大會認為，資產階級已經背叛革命，資產階級是否擁有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便無從談起了。因此，六大斷言，無產階級領導權「能在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之中就建立起來」。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國民黨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因此，資產階級包括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以及國民黨再次成為中國革命的動力之一。不僅如此，國民黨還掌握着抗日戰爭的形式上的領導權和相當一部分實際領導權，這意味着國民黨掌握了一部分當時那個階段的中國革命領導權。共產黨再次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與此相適應，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後，中共取消了30年代初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抗戰最初兩年裏，在中央的重要文件中一直沒有直接談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只是強調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

但是，六屆六中全會後才幾個月，隨着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日本軍隊對國民黨的軍事壓力減弱，國民黨又有機會重提反共了。同年年底出現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兩篇文章，全面闡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並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

## 三 修改不大的部分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中涉及領導權問題的內容，有十四處是原版就有、建國後未加修改或僅作文字修改的。

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有六處。其中三處直接談到無產階級或共產黨的領導權。一處說「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頁610）在原版中，接下去還有「就是各革命階級統一戰線的革命」。後半句後來被刪去。在頁614談到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即新

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有兩處提到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擔負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上，並指出任何其他政黨都不能領導這兩重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另外三處是說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對農民和農民戰爭的領導（見頁588、598、606）。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八處，其中只有一處簡單地提到近代工業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頁653）。有一處說，1927年到1937年，「由中國共產黨單獨地領導群眾進行這個革命」（頁662）。這只是確認曾經存在過的事實。還有一處說，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都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頁632）。這些階級都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其中沒有資產階級，因此這實際上是指共產黨對參加革命的某些階級或階層的領導，即對部分革命力量的領導。其他五處都是說共產主義思想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新文化的領導（見頁647、659、666）。

以上情況說明，這兩篇文章中與無產階級領導權直接有關的內容也是有差別的。前一篇是供黨內學習的教材，所以在談到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時比較直率，但仍是很有分寸的。後一篇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所以只是較含糊地說工人階級是革命領導者。這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其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文化的領導作用，卻很少談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權。

#### 四 重要修改之處

這兩篇文章中有七處對涉及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內容作了重要修改，而且都是把提到資產階級領導的內容刪去。新版對原版的刪改如下：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有四處：

新版	原版
頁596 中國資產階級「也曾經領導過革命鬥爭，起過主要的領導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經參加過革命鬥爭，例如北伐戰爭和當前的抗日戰爭。」	中國資產階級「也曾經領導過光榮的革命鬥爭，也曾經在革命中起過主要的或部分的領導作用，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當前的抗日戰爭。」  (黑體為新版刪改的文字，下表同。)
頁608 「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與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
頁608 「抗日戰爭以來，因為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所以……」	「抗戰以來，因為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所以……」

頁612 「民主共和國的徹底完成，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政策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	-----------------------

《新民主主義》中有三處：

頁629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或參加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
頁633 「在五四運動以後，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	「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而有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
頁635 「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從新版和原版的對比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原來的意思是，無產階級參加並且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資產階級在這個革命的某些階段也起了「部分的」領導作用（在原版《〈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曾把北伐戰爭稱為「資產階級的北伐戰爭」）。經過修改以後意思就變為，從五四運動起，中國革命就一直完全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只是在某些階段參加了革命鬥爭，沒有起任何領導作用。這正是1949年以後中共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長期流行的說法。

## 五 領導權、革命綱領、土地革命

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歷來把取得政權看作革命的根本問題。毛澤東在原版中對領導權問題的態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以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

大部分時間裏所面臨的困難處境。任何政黨要成爲革命的領導者，都必須以其綱領和實踐證明自己能代表廣泛的社會階層的利益，從而贏得參加革命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擁護。在這方面，共產黨同國民黨相比並不佔有很大的優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提到共產黨具有某些優勢的兩個方面。一個是提出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並決心付諸實施，另一個是單獨領導土地革命從而贏得農民的擁護（見頁633、648、649）。這些正是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領導的主要理由，也是共產黨在當時掌握的那部分革命領導權的主要內容。並在原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中，多次強調堅持已經取得的這部分領導權。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還提到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也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實際上當時共產黨對這部分人的影響還沒有像對農民那樣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

就是在農民和革命綱領這兩個方面，共產黨的優勢地位也不是絕對的、不可改變的。中國農民分散、隔絕的特點，使共產黨只能在其力量所及的地區通過土地革命（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減租減息）取得農民的擁護。雖然抗戰初期大片原爲國民黨統治區的國土失守，爲共產黨提供了擴展農村根據地的絕好機會，但由於共產黨必須以有限的力量對付日本和國民黨的雙重壓力，能全面推行減租減息的穩固根據地仍然有限。在廣大的其他地區，共產黨對農民的領導只是理論上的。

在革命綱領方面，毛澤東曾反覆說明，新民主主義同三民主義是基本相同的，它們之間在內容上的區別主要是前者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更重要的是共產黨決心將其綱領全部付諸實施，因而具有「革命徹底性」。這個優勢當然是相對於國民黨過去未能有力地推行三民主義而言的。那末，國民黨是不是注定只能把三民主義掛在口頭上呢？抗日戰爭開始後，國民黨一直在堅持抗戰，即堅持了民族主義；並且對發展民主政治作了某些承諾。看來國民黨也在發生變化，其作爲可能超出十年內戰時共產黨對它的估價。毛澤東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預言，「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並且表示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後都要同國民黨長期合作。在原版《新民主主義論》中把資產階級稱爲「覺悟了的」新政治力量，把國民黨同共產黨並稱爲「革命的政黨」。

由此可見，領導權問題的關鍵是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也參加了革命（毛澤東經常稱新民主主義革命爲「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就存在着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分享領導權，甚至共產黨不得不容忍國民黨掌握大部分領導權，而使自己更加遠離政權的可能；無視或不承認這種可能又會迫使資產階級抵制統一戰線，使共產黨回到過去經歷過的那種較孤立的狀態。要擺脫這種困境，就要等待國民黨失去民心，證明它自己沒有領導革命的能力和掌握政權的資格。在這一時刻到來以前，共產黨只能逐步積蓄力量、擴大影響，同時作出必要的妥協。毛澤東充分意識到了這些。所以，他不得不在領導權問題上小心謹慎，採取既積極爭取又留有餘地的克制態度。

## 六 領導權與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原來關於領導權問題的觀點同他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一致的。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並沒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完全由共產黨領導之間建立某種必然的聯繫。毛澤東認為：十月革命後世界已進入新式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時代；在此期間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生的一切革命，不論由誰充當領導者，都是這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切參加革命的階級和個人，不論主觀願望如何，都是這個世界革命的同盟軍。他把這些看作中國革命之所以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原因。所以，關鍵在於時代賦予中國革命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部分的意義，共產黨的領導只是「更加增大了」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他在文章中用這些觀點解釋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在原版中他還指出，蔣介石在1925年也說過「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稱這是「正確的命題」，並以此作為文章第四部分的標題。毛澤東意在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關鍵環節是國民黨也能接受的，國民黨把內容與之基本相同的綱領叫作三民主義，這並不影響問題的實質。

與有關領導權的修改相聯繫，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革命前途的內容也作了修改。兩篇文章中原有五處提到革命勝利後應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或幾黨專政的國家，後來在前面增加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或其他類似的話（見頁610、632、635、639、665）。前一篇文章原來只提到兩個社會主義因素，即「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大」和「農民、知識分子與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權」，後來增加了「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頁613）。在後一篇文章的頁633也增加了類似的內容，並稱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在頁665增加了大段有關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社會主義因素的內容；在頁629增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並且在頁666刪去了現時不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既然革命是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同領導的，就不可能在革命勝利後立即建立起無產階級單獨領導的國家，也不可能設想在這個國家中有如此眾多的「起決定作用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修改顯然是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製造輿論。

## 七 抗戰後的聯合政府建議

鑒於當時一方面是國共兩黨關係惡化，另一方面是國內外推動兩黨繼續合作的力量也在增強，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公開指責國民黨主要領導集團企圖維護「封建法西斯獨裁國家」，同時集中闡述了一個以國共兩黨繼續合作為基礎的建國綱領。這個綱領把他在1939—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進一步具體化，其核心是在戰後成立一個以國共兩黨為主的聯合政府。

在文章中，毛澤東多次提到抗戰勝利後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中國」。他認為，這個國家應實行「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制度」。在原版中，毛澤東從未說過這樣的制度應由哪個階級或政黨領導，新版中所有有關無產階級對未來國家的領導的內容都是後加的（見頁1005、1007、1008、1011）。頁1009提到的「由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也是後加的。

在新版中還增加了有關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的內容，如「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見頁1007）。與此相適應，刪掉了原版中一些關於在當時的中國不應搞社會主義的內容，例如，「這不是一個由於甚麼人在主觀上想做或不想做這種推進的問題，而是一個由於在客觀上中國的政治條件與社會條件不許可人們這樣做的問題」，等等（見頁1004）。這句話被全部刪去。原版中有，「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其中「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後來被刪去（見頁1004）。在提到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應發展資本主義時，原版除援引孫中山所說「節制資本」、不允許私人資本操縱國計民生以外，未加任何限制，新版增加了某些限制。例如，在提倡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面增加「在一定的條件下」；把「發展資本主義」改為「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把「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改為「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以上見頁1009）。此外，還刪掉了一整段歡迎外國大量投資的內容。

## 八 對國民黨、三民主義的態度

儘管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對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表示了極大的不信任，在原版中他仍對國民黨內部的進步勢力有較高的估價。他認為，國民黨內「有許多領袖人物」不屬於反動集團，「有更多的幹部、黨員群眾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群眾並不滿意這個集團的領導」，在國民黨的軍隊和機關裏「包藏着廣大的進步的民主分子」。在新版中，「許多領袖人物」改為「一部分領袖人物」，「更多的」幹部群眾改為「不少的」幹部群眾，「廣大的進步的民主分子」改為「不少的民主分子」（見頁996）。在頁1036也有類似的修改。此外，還刪去一大段關於把國民黨軍隊改造為「人民的軍隊」的內容。

以上修改說明，毛澤東當時所闡述的共產黨的建國綱領比後來人們看到的要謹慎得多，甚至比原版《新民主主義論》還要謹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當時認為，戰後中國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方向是確定無疑的，但在具體形式上，特別是在未來國家領導權的問題上，仍然存在着多種可能性。由於當時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都還不如國民黨，由於抗日戰爭的勝利可能會暫時加強國民黨的統治，也由於當時世界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團結合作，中國共產黨還很難對國內局勢施加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中國的前途仍然主要取決於國民黨能否克服充斥其上層的強大的頑固勢力，實行三民

主義，特別是成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儘管當時國民黨作此變革的可能性並不比1940年時更大，但也沒有消失。原版中多次提到國民黨內部存在着廣大的進步力量，說明共產黨估計到了這種可能性；在建設新中國的綱領中避而不談未來國家的領導權，顯然也是由於考慮到了這種可能性。

《論聯合政府》中所說的新中國或「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也不意味着用武力推翻當時的中華民國，只是要求對其加以改造或「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改革」。既然抗戰初期共產黨可以承認國民黨在當時的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既然國民黨仍有可能實行三民主義，為甚麼不能設想一個以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為主要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呢？原版《論聯合政府》的內容表明，如果國民黨願意廢止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毛澤東打算接受這種前途。毛澤東在原版中還一直把民族資產階級稱為「自由資產階級」（這在他的著作中是罕見的），還指責國民黨統治集團「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這似乎是在暗示，這種英美式的自由主義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 九 形勢的變化

1945年以後的兩年多時間裏，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未來國家的領導權問題以最有利於共產黨的方式得到解決。

中共七大閉幕後才兩個月，抗日戰爭就結束了。勝利到來之快，甚至出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預料。日本剛宣佈投降時，共產黨曾打算進入北平、上海等日軍佔領的城市。

在國際形勢方面，1945年初的雅爾塔會議進一步確認英美蘇三國在戰後將繼續合作。毛澤東在原版《論聯合政府》中對1945年初雅爾塔會議給予積極評價。他認為，英美蘇三大國的團結「是統治一切的」；英美蘇中法五大國將繼續團結領導世界新秩序在這種形勢下，「國際間的重大問題，必須以三大國或五大國為首的協議來解決。各國內部問題，無例外地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這表明，毛澤東充分認識到，總的世界形勢要求中國在團結中求進步，而沒有留下多少選擇其他道路的餘地。此外，他還注意到美國國內的某些有影響的勢力也對國民黨的統治表示不滿，希望國共兩黨繼續合作。他不僅讚揚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作的「偉大努力」，把英國美國同蘇聯並稱為「民主國」，還感覺美國人民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近鄰了。

隨後，在包括蘇聯、美國在內的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國共兩黨舉行重慶談判，就和平建國的方針、政治民主化和召集政治協商會議等達成原則協議。1945年12月中旬，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促進中國統一的對華政策聲明，並派遣馬歇爾為特使調解中國內部衝突；月底，蘇美英三國外長莫斯科會議要求中國停止內爭。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簽署停戰協定，月底閉幕的政協會議通過了五項關於政治改革的決議。這些協議要求：實行政治民主化，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國民黨佔一半席位、共產黨佔三分之一的聯合政府；實行軍隊國家



化，國共兩黨的軍隊分別同各自所屬的政黨脫離關係，按五比一的比例逐步混編。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政協會議的重大成果，樂觀地認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共產黨為達成協議作出了重大讓步，這正是以毛澤東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原版中闡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綱領為基礎的。看來，像毛澤東曾經估計到的那樣，中國正在走向以國民黨為主要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

但是，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沒有全部接受政協協議。國內和平進程陷於停頓狀態。從6月底開始，國民黨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1947年，國際國內的政治形勢都發生重大轉折。在國際上，戰後初期大國之間的合作氣氛開始為冷戰所代替，分別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兩個對立陣營開始形成。現在的問題是國共兩黨如何較量。這一年1月，馬歇爾宣佈他的調解使命失敗（這也是走向冷戰的步驟之一）；2月底，國共談判完全破裂。在此前後，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時局已經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後勝利」。這是30年代初以來毛澤東第一次談到革命高潮和黨的最後勝利。從1927年起的二十年裏，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等待這個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12月會議上宣佈，中國革命已經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為適應這種轉變，毛澤東對將近十年前形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綱領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補充。他公開提出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提出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政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中增加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內容。經過這次修改，「建設新中國」具有了抗日戰爭時期所沒有的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含義；奪取政權的目標在擱置十年以後重新得到確認。修改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後來成為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指導原則。

魯亦冬 大陸學者。